

从雅尔塔到富尔顿：对美苏冷战史的反思

■童小溪

本文以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达成秘密协议出卖中国主权事件作为切入点，反思二战后的美苏冷战史。通过对比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设计和杜鲁门—丘吉尔在战后的实际决策，可以发现：美苏冷战的起源在于美英集团偏离了雅尔塔所确立的美苏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的默契，但是，雅尔塔精神，即美苏合作，共同控制和主宰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也自始至终贯穿了整个冷战年代。一般的冷战史将美苏之外的广大区域边缘化，而中国恰恰被包含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主要解释为捍卫双方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一般的冷战史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然而，本文的论述努力说明：冷战期间大国之间大多数时间的“缓和”，其地缘政治对手和战略目标是指向前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

[关键词] 冷战 雅尔塔 美苏缓和 罗斯福 斯大林 第三世界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6)01-0080-07

童小溪(1962—)，男，北京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北京 100094)

一、引言

二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在黑海之滨的小城雅尔塔，秘密举行了一次影响世界历史的会议：美国、前苏联领导人背着世人，制订了一个战后美苏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的秘密协定，其中包括由美国认可、前苏联向中国政府索取一系列准“殖民”利益。“雅尔塔秩序”代表着罗斯福制订的美国战后全球整体战略：与前苏联合作，削弱德日，鼓励殖民地地区的非殖民化。然而，在罗斯福逝世后，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实行了迅速的政策逆转：实行与前苏联对抗，联合英法旧殖民主义国家压制殖民地的反抗，对欧洲、日本实行经济援助，并重新武装西德、日本这两个被击败的法西斯国家。仅仅在雅尔塔会议一年之后，在美国小城富尔顿，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说，提出“铁幕”在中欧降落”。这是美苏冷

战的开端。众所周知，美苏冷战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雅尔塔秩序”似乎昙花一现，而“富尔顿秩序”，如“铁幕”一般铁板一块。“铁幕两边”这一比喻，凝聚了冷战思维美苏二元对立的简单结构。而历史却必然是复杂的、矛盾的，甚至是违反人的直觉的。一般的冷战史，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它将一个广大区域、众多的民族国家，和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历史体验边缘化了。比如，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从未正面作战，反而在亚洲进行了三场大规模热战，即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三场战争通常被当作美苏代理战争的案例，^①而被忽视的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历史和内部的因素，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因素。而这种历史书写将非西方世界边缘化，实际上展现了“雅尔塔秩序”的经久持续的巨大威力，也暴露出“雅尔塔秩序”和“富尔顿秩

序”的内在联系：它们并非存在着天壤之别，而只是同一国际丛林法则的不同历史展开而已。下面就展开分析有关历史细节，以支持上述观点。

二、雅尔塔秩序的来源

为理清冷战的根源和头绪，就必须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谈起。雅尔塔会议可以说是整个二战期间所发生对战后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次“分封天下”的会议是背着世人秘密举行的，会上所作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决定，直到一年半以后，才通知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雅尔塔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战后的世界格局，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和细致的安排；而这个安排，是由罗斯福、斯大林共同决定的，是建立在当时世界舞台上这两位超级选手之间的私人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雅尔塔密约的根本精神是战后美苏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罗斯福所作的这个决策的出发点是：美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实力无可匹敌，自信充足，相信战后各国的实力都被战争大大削弱，唯独只有美国不但未被削弱，反而成为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罗斯福表现出自己一贯的“国际主义”倾向，认为在战后凭借美国的实力，完全能够在以合作代替对抗的前提下，达到美国在全世界想达到的一切目的。另外，具有进步倾向的罗斯福，也坚信美国自伍得罗·威尔逊以来所宣称的“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的价值，选择了前苏联而不是英法老殖民主义国家，作为战后的合作伙伴。雅尔塔协议在具体内容上有以下几点：以战后对苏联实行经济援助和其他帮助，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对美国的服从、合作；战后对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造，为防止它们再度成为战争威胁，将在这两个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非工业化；美国不会帮助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经济恢复，相反，要督促英法放弃殖民地；将引导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走

温和的政治道路，经济上加入由美国所主宰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这个所谓“雅尔塔秩序”所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战后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的前途。罗斯福已经预感到，在太平洋的战火熄灭后，各殖民地的人民将普遍提出非殖民化和民族独立的要求。美国的目标在于：在这些人民拒绝了老式的殖民主义体系之后，想办法把他们纳入到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市场型的经济体系内来，从而使美国的价值传遍世界，美国的资本主导全世界。罗斯福所提出的策略，是将前苏联作为合作者，一道来控制、引导经济上落后但潜藏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潜能的殖民地地区。

从罗斯福时期美国对国共矛盾的调停行动看，罗斯福所设计的战后秩序是扶植温和的自由主义非共政权，它既不满意国民党这样腐败、专制并带有法西斯倾向的政权，又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强烈的民族解放使命感和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的政治组织掌握中国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前美国方面对国共双方的态度游移不定、难于选择的原因。^②

雅尔塔秩序所设计的美国、前苏联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三角战略关系，被完整地体现在雅尔塔协议中有关中国的远东条款部分。我们可以相信，假如没有后来美苏关系的急转直下，那么，美苏在雅尔塔默契合作对待中国的做法，会成为处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事务的样板，类似地照搬到其他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以旅顺租界、满洲特权等条件换取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但罗斯福给斯大林的奖赏却并不需要美国自己掏一分钱：由于美国的强大和当时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使蒋介石对这笔交易既不敢对美国发火，也不敢对苏联动怒，乖乖地吃哑巴亏。蒋经国在其自传《风雨中的宁静》中记载：1945年8月，宋子文在与斯大林谈判落实雅尔塔协议的条文时，曾经据理力争民族利益，斯大林拿出美苏密约文本，

说：“请你们找美国人讲。”宋子文顿时无言。^[1]可以说，美苏联手遏制“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家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杜绝了“第三世界”打美苏两张牌的可能性。前苏联在拿到好处后作了承诺，即支持蒋介石，不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不参与中国内战。在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上，美苏是惊人的一致，开始都希望有和谈、联合政府的可能，后来又都希望划江而治。国民党溃退时，苏联大使馆紧跟国民党迁都甚至比美国跟得还要紧一些。

雅尔塔密约的远东条款部分，可以看成是罗斯福所设计的美苏合作对付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总体策略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出，这笔交易，对美国和苏联都有利可图，双方互惠，中国的利益被当成交易砝码被出卖。在美苏联手的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积弱国家（假如没有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无法做出反对两个强国的举动。雅尔塔秩序在中国的应用可说是很成功的，这自然是强权政治的又一次典型操作。

三、冷战的起源

正因为雅尔塔密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个人信任，1945年5月罗斯福之死，使美苏合作的框架开始向美苏对抗的方向漂移。和雅尔塔密约相似，冷战的开始也与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的个人风格有关。杜鲁门来自美国伊利诺州保守的乡村，在观点上本来和战前的“孤立主义”接近，和罗斯福所代表的“国际主义”外交观相比，缺少自信和长远观点，倾向于怀疑、对抗和短期行为。冷战“结束”以来，“是谁首先挑起冷战”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多争议，但近年来美国和前苏联所开放的各种资料信息表明，杜鲁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始作俑者。1947年3月，杜鲁门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即“通过侵略或间接侵略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自由人民，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1950年向美国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调查》的绝密文件（直到1975年才解密公开），系统地提出了以加紧军备、以实力对抗为手段的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

首先，冷战的到来有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背景。美国在二战中急剧膨胀起来的军火工业在二战后，陷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1948年美国国内的飞机制造业的危机发展到了破产的边缘。^[2]由军火工业组成的游说团体借着同年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机会，制造了一次战争恐慌：从政府决策层到军火工业大财团和舆论媒介一致认为，和前苏联在中欧的最后较量已不可避免，甚至是迫在眉睫，仅在1948年一年内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增加了40%，前苏联自然把这项举动看作是准备入侵东欧和苏联的信号，也被迫将大量宝贵的经济建设资源转向军火生产，美苏从此无可逆转地沿着军备竞赛的道路疾驰下去。

所谓“冷战”，就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在阴谋暗算自己，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这种互相猜忌演化成恶性循环，猜忌导致对抗，对抗又反过来增加猜忌，使得愈演愈烈，造成长久的对峙。因此，假如把冷战看成是某种误会，使双方都丧失安全感，给双方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就有一个“是谁首先发难造成误会”的责任问题。

丘吉尔于1946年3月发表著名的富尔顿演说，提出了所谓“铁幕”在中欧降落”的说法，指责苏联在东欧得寸进尺，企图赤化西欧。通常意义理解下的冷战秩序（这里权且称之为“富尔顿秩序”）被建立起来。自1947年起，这个“富尔顿秩序”取代了罗斯福与斯大林共同商定的“雅尔塔秩序”，并一直主导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止。

西方集团积极投入冷战中的对抗，其理由是：“苏联在东欧得寸进尺，企图赤化西欧。”然而事实是，在二战未结束时英美就在前苏联周边地区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对苏攻势。为防止

因抵抗纳粹而强大起来的当地共产党战后在希腊和土耳其得势,英美联军在 1944 年就开始和希腊、土耳其的法西斯分子联手围剿当地共产党。前苏联在二战中经历了立国以来的最大一场浩劫,对新的战争威胁有着过度敏感的警惕。冷战“结束”后新公开的一系列资料表明,前苏联的战略意图仅仅是希望在周边的地区出现对前苏联友好的政权,作为缓冲地区,而对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很大热情。芬兰式的中立模式一样能够为前苏联所接受。从最近透露出来的前苏联决策层的战略思考方式表明:战后前苏联在东欧的一系列举动,如封锁西柏林交通事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上台事件等,都是在观察到希腊、土耳其的局势变化后,从主观上认为英美已经形成了对前苏联的包围圈,被迫所做出的反应。从冷战开始乃至冷战的整个过程看,美国方面有意无意地夸大前苏联的军事能力,比如,冷战结束后透露出的很多信息表明,美国在冷战中所宣传的“导弹差距”就是完全虚构的。

前苏联所采取的争取友好邻国缓冲区、消极对待当地革命这一外交战略,在远东表现得更加明显。雅尔塔交易和苏军在满洲的举动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的考虑中,是以承认蒋介石为中国的唯一合法领袖、在军事上不援助中国共产党为条件,来换取蒋介石政权成为友好的邻邦;在满洲,前苏联只打算一次性地缴获当地的工业设施,及取得铁路、港口的便利。和美国强硬派的分析相反,前苏联并没有计划通过支持中国共产党来进行远东的扩张。同样,在朝鲜半岛前苏联也采取了有节制的作法:在美军尚忙于占领日本的时候,前苏联本来有能力占领朝鲜全境,但却没有这样做,仅满足于使朝鲜北部成为缓冲区。^[3]

综上所述,是美国首先发难,偏离了雅尔塔所确立的美苏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的默契,对前苏联采取不信任和对抗态度,前苏联只得被迫

应战。杜鲁门的冷战策略在几个重要方面都跟罗斯福的安排相左:没有经济援助前苏联,而是给西欧、日本输血打气;没有给英法殖民者施加太大的压力去促使殖民地独立,反而支持英法在马来亚和印度之那的新殖民战争;没有在西德、日本实行非工业化,而是恢复它们的经济实力,把它们建成反共的堡垒。

可以看出,雅尔塔所设想的世界格局和后来的冷战格局有着天壤之别。不难想象,假如不是罗斯福人亡政息,而是雅尔塔秩序得到贯彻,战后世界将会出现的局面:欧洲、日本将陷入长期的经济低潮;美国会督促英法等老殖民国家交出马来亚、印度之那、香港等殖民地。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会迅速蜕化成为类似葡萄牙、西班牙等有着“光荣”的过去、但从此一蹶不振的次等国家。日本、德国的工业会被大规模拆迁,实现非工业化,日本甚至可能会被美苏分治,被瓜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前苏联将在第三世界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在第三世界扶植温和、顺从的自由主义政权,把它们纳入美国所主宰的国际贸易体系;美苏会出于共同利益,联手干涉中国、朝鲜、印度之那的内部冲突,中国内战的结果也会成为变数。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雅尔塔秩序”的设计,也许会觉得它与战后的实际发展大相径庭。然而,容易发现的是,战后美苏在对抗过程中,只要一出现“缓和”,雅尔塔的幽灵就浮现出来,就形成美苏合作收拾世界上不听话的国家的局面。20 世纪 60 年代中,“雅尔塔秩序”被部分地复活,形成了美苏联手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展开热战或者冷战。

尽管杜鲁门一手改变了罗斯福所制订的雅尔塔秩序,但并没有改变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改变的只是手段。美国在战后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应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因旧的殖民体系崩溃而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这一点罗斯福就已经料到。杜鲁门从罗斯福手中继承

下来这个战后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是以前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将本来是“第三种势力”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向苏联阵营。

这里,不能不承认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种势力”,经常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在雅尔塔,斯大林是从前苏联国家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从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甚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大局”出发,而只为了短期的和狭隘的好处和罗斯福作交易。然而,前苏联毕竟是由列宁所创立的国家,它至少在政治思想上一直坚持列宁的“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和解放”的立场。当美国方面背弃在雅尔塔订下的合作承诺,前苏联也被迫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幻想,并由于深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在冷战中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不情愿的联盟。然而,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妥协倾向,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全面发展成为向美国妥协、和美苏联手压制不听话者的路线。顽固的雅尔塔秩序又复活了。

四、雅尔塔、冷战和三场亚洲战争

杜鲁门将美苏合作的雅尔塔秩序一手转变为美苏冷战的战略逆转,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出两个巨大的后果:第一,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从罗斯福所标榜的“进步”的反帝反殖、民族自决、“威尔逊主义”、“大西洋宪章”精神,转向保守的“新殖民主义”。这是因为:第一,要与民族解放势力直接对抗,就不仅要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势力合作,还要利用和扶植当地的保守买办阶层,暂缓甚至取消当地的土地改革,而这些做法,服务于镇压民族解放的政治、军事短期目标,却直接阻碍了当地社会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台湾、南韩的土改则是出于战略目的、在美国的直接参与和大量资助下进行的)。第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民族

主义,被推向左倾。这两个后果,都是杜鲁门所代表的美国资本家所始料未及、大概也不愿看到的。

雅尔塔密约有关美苏合谋损害中国利益,最集中地表现了雅尔塔的精神,而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美苏态度的演变也最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美苏由合作转向对抗,从而将一场实质是中欧地区的两个国际军事集团的对峙,与远在世界东方的一场内战扯在了一起。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达成了战后共同对付民族解放运动的默契,即前苏联不在亚洲支持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共产党,而由美苏共同扶植温和的、对美苏都友好的政权,作为报酬,前苏联得到它周边地区的安宁和相关利益。这个默契,直到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和宋子文在落实雅尔塔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时,还是完好的。苏军在东北基本上执行了不偏不倚、保守中立、获取实利的策略。是发生在遥远的中欧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导致美国坚定了对中国战场的态度。1946年到1948年间发生的罗马尼亚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柏林危机等,使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作相应的调整,对中国内战开始明确地偏袒一方,而且恰好就是毫无希望取得胜利的国民党方面。美国的这个选择,与其说是看好蒋介石政权,毋宁说是因为错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前苏联扩张的工具。而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承认,则是完全出于被动。

比较美苏对中国内战双方的支持,就会发现,美国对国民党方面的支持是大方慷慨、不遗余力的,尽管美国对国民党政府不太满意;而苏联对共产党方面的物质援助几乎没有,道义上的支持也很勉强。中国内战的三年,也是冷战阵营逐渐形成的关键三年,美日联盟的轮廓越来越清楚,蒋日联盟的条件也就越来越成熟了。日本前侵华部队中有着大量熟悉中国情况、具有在中国作战经验的人,他们出于对国民党政府

宽大政策的报答或出于自身的反共信念,在内战中得到国民党一方的重用。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就是日本侵华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为报答蒋介石对他们的赦免释放,赴台湾协助国民党训练军队,成立了“白团”。^③和这些日本志愿人员对国民党的精诚帮助相比,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是那么微薄和精打细算。

中国内战战火刚歇,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然后是绵延三十年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前苏联在远东执行保守防御战略,并不积极支持朝鲜北方的军事行动。联大安理会两次表决谴责北朝鲜,前苏联均故意缺席来躲避投否决票,令人怀疑前苏联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希望在朝鲜半岛出现美国干涉的局面。斯大林在中国多次请求下仍拒绝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致使美军在战争初期占了绝对的空中优势。战争中前苏联所提供的全部军火费用皆由中国偿还。

印度支那战争的根源,在时间上比“东西方阵营”的出现早半个多世纪,在地理上和中欧的铁幕相差万里。印度支那当地人民在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殖民统治后,有强烈的愿望驱除老牌殖民统治者,防止法国卷土重来,这种愿望和美国所一贯口头标榜的“威尔逊主义”、民族自决、“大西洋宪章”精神等等可以说完全一致。在越盟方面,也是一直采取突出民族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的姿态,并对在印度之那尚未插足的美国示意友好。然而,是美苏在中欧的对抗加剧,导致美国调整全球的战略,将“督促英法放弃殖民统治”的策略一转为“协助英法恢复巩固殖民地”的策略,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印支人民从19世纪末到上世纪70年代为彻底摆脱近百年的殖民主义的外来统治(其中西方殖民主义占了九十多年,日本殖民统治只有四年),和前后数个不同的殖民者的抗争,是在这样阴差阳错的情况下,被笼罩上了美苏“冷战”

的阴影、被纳入“东西方”两个阵营。

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标志着美苏“缓和”的开始。也正是在这个前后,苏联压迫中国在台湾海峡不要惹麻烦,以免破坏美苏“缓和”。沉寂了多年的雅尔塔精神复活了。整个越战期间基本和“缓和”时期相重合。前苏联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较多,但仍以不破坏“缓和”为前提。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印支问题采取“插手政策”,开始向越南北方供应武器装备,同时希望越南事态按照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向发展,纳入美苏两家共同主宰世界的轨道上去。1965年1月,美国要求前苏联政府施加其影响,使越南北方政府接受两项条件:第一,停止支持越南南方,首先停止供应火炮;第二,停止对越南南方城市的袭击。前苏联领导正式向越南北方政府作了转达。1965年2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无条件讨论”的建议,前苏联领导人立即附议。从1965年到1967年之间,前苏联提出了许多和谈主张与方案,实际上都是转达了或配合了美国的“和谈”动议。^[4]

和前苏联的观望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美国对这三场战争的态度是一次比一次认真投入。美国在这三场战争中耗费的资财分别为五十亿和上百亿美元之巨。^[5]美国是把它们当作冷战中的热战、当作意识形态战争来打的:美国既意识到三场战争的亚洲地缘性质,又把它和美苏全球对抗相联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2年的一份文件中说:“东南亚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输给共产主义侵略都具有重大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后果。假如没有及时和有效的补救行动,丢失任何一个国家将会导致这一组国家中的其余成员迅速地屈服于共产主义或与其结成同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天然橡胶和锡矿的主要来源,也是石油和其他重要战

略产品的产地……失去东南亚,特别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将增大日本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导致日本很难防止最后向共产主义妥协。”^[6]

上述以典型冷战语言所叙述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实际上透露出—个宏大的战后亚洲战略,它表面上和“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对抗有关,而实质上与延续日本帝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殖民地联系密切相关。

可以说,二战后发生在亚洲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是整体性的。这些冲突的关键支点在亚洲,而不是在美苏争夺的焦点,即中欧和中东。具体说,这个支点在日本列岛,它支撑着横跨太平洋的日美军事同盟,和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即牢固地控制日本,限制中国,以及使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成为日本的经济腹地。美国在亚洲的远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也促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五、结语

1946年到1990年间的美苏冷战已成为历史。中外主流史学大多关注其意识形态方面优胜劣败的意义,然而问题是:主流史学的这种关注本身,就带着本身特有的意识形态;将冷战史归结为“意识形态战争”,将冷战结束归结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身就陷入特定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偏见的陷阱。显然,1946年到1990年间的世界历史,不能完全归结为美苏冷战史,因为在西方集团和前苏联集团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亚、非、拉世界。主流的冷战观,是把这些其他国家按照程度不同,划分为盟友国、代理国、势力影响范围、争夺对象等等,从而被简单地归类到美苏冷战范畴内。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达成协议出卖中国主权的一幕,是本文对主流冷战史观点进行反思的切入点。实际上,雅尔塔的阴影贯穿着整个冷战时代,而

雅尔塔精神,就是美苏合作,共同控制和主宰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主流冷战史是将这个广大区域边缘化的,而中国恰恰被包含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冷战期间,发生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事件,这可以看成是冷战史上的一个特异事件,尽管这段插曲的历史意义已不再被人们提起,甚至不再被人们所记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主流冷战史背后,还隐藏着一部较少被书写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读到的,不完全是两个超级大国为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而进行圣战的故事,而更多的是人类数千年来古老故事:强大势力合谋在一起,分封天下,支配弱小,尽管一度也曾出现过弱小者联合起来与之抗争的插曲。

注:

①所谓“代理战争”,就是在世界两极局面下,美苏不直接正面冲突,而是在“第三世界”的战场上出钱、出枪,援助各自的“代理人”、傀儡政权,让他们去厮杀较量。

②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给罗斯福的报告,见伊·卡恩《中国通》,1944年7月10日。

③见1995年10月27日《中国时报》。

[参考文献]

[1] 蒋经国. 风雨中的宁静[M]. 台北:正中书局, 1995.

[2] 考夫斯基. 杜鲁门和1948年的战争虚惊[M]. St. Martin's Press, 1993.

[3]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 - 1947[M]. Princeton, 1981.

[4] 中国外交史[M]. 1988. 344, 347.

[5]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Z].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6]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Z].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entagon Papers, Bantam Books, 1971. 27 - 32.

【责任编辑 彭勃】